

杜甫詩史與六義之比興

——兼論敘事歌行與《春秋》筆削

張高評

提 要

晉杜預，為杜甫十三世祖，著《春秋經傳集解》，其《序》文特提微、婉、顯、晦之法，懲惡勸善之義。揭示敘事傳統無數法門，為《春秋》學之一大功臣。杜甫三十歲時，曾作《祭遠祖當陽君文》，宣稱不敢忘本，不敢違仁。於是《春秋》與詩，同為杜氏家學。杜甫流離隴蜀，所作敘事歌行，世號“詩史”，《本事詩》所謂“推見至隱，殆無遺事”者。敘事傳人之際，遂多《春秋》書法之體現。諸如屬辭比事，筆削顯義；據事直書，美惡自見；微婉顯晦，推見至隱；以小該大，因彼見此；偏載略取，舉輕明重；直斥不宜，曲筆諱飾；彼此相形、前後相繫，行屬辭比事之法；詳略、異同、重輕、忽謹，指義見乎筆削，其大者焉。杜甫於安史之亂前後所作敘事歌行，如《麗人行》、《哀江頭》、《贈花卿》、《戲作花卿歌》、《丹青引贈曹將軍霸》、《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諸什，除轉化《春秋》書法為詩史之外，且多寓抒情於敘事之中。正杜甫稱元結《舂陵行》，所謂“比興體制”；章學誠所稱：“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敘事傳統，可以兼涵抒情傳統，由杜甫詩史，“比興發於真機，美刺該夫衆體”，可見一斑。

關鍵詞：杜甫詩史 六義比興 筆削見義 敘事歌行 《春秋》書法 中國敘事傳統

一、前 言

所謂傳統，指發生於過去，卻持續作用到現當代。所謂敘事傳統，應該是根植於中國文化土壤，栽培孕育出來的花果。研究的文本，是中土的；探論的方法，也是傳統的。原汁原味，才堪稱中國敘事傳統，或傳統敘事學。

中國敘事傳統胎源於《春秋》，拓展於《左傳》，成熟於《史記》。從此踵事而增華，變本而加厲。自《史記》、《漢書》以下，廿五史、《資治通鑑》等史傳、六朝唐宋樂府敘事歌行、六朝志怪小說、唐宋傳奇小說、敦煌變文、宋代話本、《高僧傳》、《神仙傳》，以及元明清小說與戲劇，源遠流長，皆為中國敘事文學之一環。推而廣之，至於寓言、笑話、碑傳、墓誌，述事傳人，也都關涉到敘事，或敘事手法。¹

《禮記·經解》稱：“屬辭比事，《春秋》教也。”² 孔子或筆或削魯史《春秋》，以體現進退予奪、褒貶勸懲之指義。由於筆削之義，出自孔子“竊取之”，故《春秋》微辭隱義，不直說道破，避就留餘，多言外曲致。《春秋》筆削魯史，於史事作或詳或略，或重或輕之依違取捨；其於辭文，則有異同、因革、詳略、重輕之分野，以及直曲、顯晦之差別。孔子《春秋》固因事以屬辭，讀者則據辭可以觀義。故研治《春秋》者，往往藉由史事之排比編纂，辭文之連屬修飾，以考求《春秋》之指義。宋朱熹(1130—1200)謂：“《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³ 蓋因法以求義，猶即器以求道，藉形而傳神，可以致廣大而盡精微。

清章學誠(1738—1801)，為乾嘉知名文史評論家。曾云：“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其原本於《春秋》‘比事屬辭’之教。”⁴ 章學誠強調“史家敘述之

1 張高評：《〈春秋〉〈左傳〉〈史記〉與敘事傳統》，《國文天地》第33卷第5期(2017年10月)，頁16—24。

2 戴聖傳，孫希旦集解：《經解第二十六》，《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卷48，頁1254。

3 《易三·綱領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67，頁1673。

4 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上朱大司馬論文》，《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冊下，頁768。

文，本於《春秋》比事屬辭之教”。⁵《左傳》為紀傳之淵海，古文辭之典範，故長於敘事。而所謂敘事、紀傳、古文，皆《左傳》文章之不同層面，且亦各臻其妙。因此，章氏以為：敘事、古文、史學、書法，根源同出於“比事屬辭”之《春秋》教。筆者以為：中國傳統敘事學之理論基礎，唐劉知幾（661—721）之後，章學誠《文史通義》、《章氏遺書》已作具體而微之提示。⁶

安史之亂前後，時當開元、天寶之際，杜甫（712—770）所作敘事歌行，如《兵車行》、《麗人行》、《哀王孫》、《哀江頭》、《悲陳陶》、《悲青阪》、《塞蘆子》、《北征》、《彭衙行》、《留花門》、《洗兵行》、《三吏》、《三別》、《丹青引贈曹將軍霸》、《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義鶻行》、《戲作花卿歌》、《贈花卿》、《杜鵑行》、《冬狩行》諸什，皆世所謂“詩史”者。除長於敘事、以詩補史闕之外，往往主文而譎諫，運用曲筆諱書，出以“推見至隱”，是所謂以“《春秋》書法”為詩法，其要歸於資鑑勸懲。杜甫，為杜預十三世孫。於征南大將軍之《春秋》、《左傳》學，頗得傳法傳心之妙；於所謂《春秋》書法，亦耳熟能詳，長於躬行實踐，體現於敘事歌行之中。世所謂“詩史”，即此是也。

二、杜甫詩史、《春秋》書法與中國敘事傳統

（一）孟啟《本事詩》稱說杜甫詩史

杜甫於安史之亂前後，所作系列敘事歌行，指稱為詩史，最早文獻見於晚唐孟啟《本事詩》。其中，“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提示詩史寫作之特定時空；而“推見至隱”四字，為孟啟“詩史”說之關鍵術語，說“詩史”者多忽之。孟啟⁷

5 章學誠著：《信摭》，《章氏遺書（外編）》，（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年），卷1，頁831。

6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章學誠之〈春秋〉教：史學、敘事、古文辭與〈春秋〉書法》，《中山人文學報》第36期（2014年1月），頁31—58。

7 《本事詩》之作者，為僖宗乾符二年（875）進士。其名，世俗多作孟“榮”，首見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四庫全書總目》、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等因之。然《新唐書·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郡齋讀書志》皆作孟“啟”，明毛晉《津逮秘書》從之。論者詳舉上述文獻，佐證《本事詩》作者應作孟“啟”。又援引洛陽出土孟啟家（轉下頁）

《本事詩》云：

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⁸

案：“推見至隱”四字，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⁹ 司馬遷私淑孔子，《史記》典範《春秋》；太史公明示“推見至隱”，爲《春秋》之特色書法，與“本隱之以顯”之《易》經屬性，表現手法判然有別。覆按《本事詩·高逸》之原意，稱杜甫叙寫安史之亂“流離隴蜀”事，當時號爲“詩史”者；孟啟持“推見至隱”詮釋之，自司馬遷《史記》觀之，隱然以《春秋》書法論杜甫詩。簡言之，以“推見至隱”解讀“詩史”，自然與《春秋》之書法密切相關。

考察杜甫流離隴蜀，所作敘事歌行，《本事詩》所謂“推見至隱，殆無遺事”之詩史，敘事傳人之際，自多《春秋》書法之體現。諸如屬辭比事，筆削顯義；據事直書，美惡自見；微婉顯晦，推見至隱；以小該大，因彼見此；偏載略取，舉輕明重；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以其所不書，推見其所書云云，其大者焉。¹⁰ 杜甫所作系列“詩史”之作，具含“推見至隱”之特色，遂指爲“《春秋》書法”之體現者，此自有說。蓋杜甫三十歲時，曾作《祭遠祖當陽君文》，據此而推拓之，乃情理之實然應然。《祭文》之言曰：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寒食之奠，敢昭告于

(接上頁)族四方墓志，如《唐孟氏冢婦隴西李夫人墓志銘并叙》等爲證，撰文呼籲，應正名作孟“啟”。詳參陳尚君：《改一個字好難》，《濠上漫與——陳尚君讀書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45—47。

8 孟啟（槩）：《本事詩》，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5。

9 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年），卷117，頁1264。

10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6年），第七章《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頁303—332。附錄二《〈春秋〉書法與修辭學》，頁515—545。

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之靈。……恭聞淵深，罕得窺測。……《春秋》主解，稿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靜思骨肉，悲憤心胸。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¹¹

當陽君，為杜甫之十三世遠祖，即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杜預（222—285），號稱杜武庫，平生有《左傳》癖，著有《春秋釋例》、《春秋經傳集解》等書，堪稱闡發《春秋》、《左傳》學之大功臣。《祭遠祖當陽君文》云：“《春秋》主解，稿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遠祖杜預主解《春秋》經傳之貢獻，杜甫推崇贊揚；無奈筆跡流宕，後繼乏人，不由得爽然若失。“靜思骨肉，悲憤心胸”之餘，於是“築室首陽之下”，緬懷遠祖杜預立言不朽之功業，宣言“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由此觀之，杜甫《祭遠祖當陽君文》，已發願繼志述事，當仁不讓，可以想見。杜甫當下所作祭文，大有肯堂肯構，捨我其誰之氣魄在焉。

《禮記·經解》稱：“屬辭比事，《春秋》教也。”¹²杜預所著《春秋經傳集解》，對於語詞、字句、篇章，曾作解說。就比事而言，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對於章句之解讀，涉及對《春秋》經與《左傳》文本結構之詮釋。杜預《春秋序》稱《傳》之釋《經》：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論者所謂張本說、終本說、聯本說，要皆歷史編纂學之比事手法、敘事藝術。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於《春秋》、《左傳》原典，解說其中之語法與修辭，如實詞、虛詞、句法、修辭之類。杜預對語詞、章句之訓解，體現了杜預《春秋》學屬辭約文之章法修辭工夫。¹³

杜預注《春秋左氏傳》，既以敘事見本末發明《春秋》書法，故于《左傳》先《經》以始事、先事以張本，不必然與《經》同年、《經》不書、《左傳》因他事而兼及諸例，多所發凡。¹⁴論者稱，杜預注《春秋》經傳，或闡明沿革，或推源求解，

11 《祭遠祖當陽君文》，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25，頁2216—2217。又，《進雕鶚表》云：“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頁2172。

12 戴聖傳，孫希旦集解：《經解第二十六》，《禮記集解》，頁1254。

13 李孝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注釋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

14 葉政欣：《集解所明之左傳體例》，《春秋左氏傳杜注釋例》，（臺北：嘉新水泥公司基金會，1966年），頁126—137。

或重見互注,揭示若干前後會通之例。¹⁵ 此自是呼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所謂“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之說。¹⁶ 要之,皆有得于古春秋記事之成法,以及屬辭比事之《春秋》教,而發用於解讀經傳者。¹⁷

由此觀之,杜甫詩史、敘事歌行,所以富含《春秋》書法者,大抵為落實而立之年所作《祭當陽君文》,築室洛陽首陽山下,承諾“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十三世遠祖杜預著《春秋經傳集解》,於《春秋》、《左傳》比事與屬辭之闡發,貢獻良多,影響深遠。杜甫薪傳《春秋》家學,遂得以轉化為“詩史”之書寫策略。於是,在“詩是吾家事”之外,杜甫結合詩歌、敘事,融鑄經學、史學與文學,而蔚為家學之薪傳與發用。清劉鳳誥(1760—1830)《杜工部詩話》,曾論證杜甫《祭遠祖當陽君文》之內涵,其言曰:

杜(甫),為晉征南將軍預之後。子美《祭遠祖當陽君文》自稱“十三葉孫甫”,其曰:“《春秋》主解,稿隸躬親。”述預為《春秋左傳集解》也。《進雕賦表》:“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則其根柢經術,固有自來。詩中援引,如《懷李白》云:“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以季武不忘韓宣一事,翻成兩語;《兵車行》云“新鬼煩冤舊鬼哭”,化用夏父弗忌“新鬼大,舊鬼小”語;《前出塞》云“射人先射馬”,本“樂伯左射馬右射人”語;《投贈哥舒開府》云:“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以翰年老風疾,比之廉頗;玄宗賜音樂田園,比之魏絳賜女樂歌鐘。運用神明,洵為克承家學者矣。¹⁸

劉鳳誥《杜工部詩話》,論證杜甫《祭遠祖當陽君文》之“《春秋》主解,稿隸躬

15 方輅:《〈春秋經傳集解〉注釋釋例》,《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149—157。

16 左丘明著,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卷1,頁18。

17 張高評:《〈左傳〉敘事見本末與〈春秋〉書法》,《中山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頁1—13。

18 劉鳳誥:《杜工部詩話》,張忠綱:《杜甫詩話六種校注》,(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卷1,頁265。

親”，舉例申明杜詩遣詞隸事，多採用《春秋左氏傳》之史事與辭語。如《懷李白》、《兵車行》、《前出塞》、《投贈哥舒開府》諸什皆是。於是贊揚杜甫，以為“運用神明”，“克承家學矣”。杜甫作詩，宗法《春秋左氏傳》，肯堂肯構如此，誠所謂“根柢經術，固有自來”。夷考其實，劉鳳誥《杜工部詩話》所示，舉例說明，止是杜詩化用《左傳》之事與語，觸及枝葉而已，未得其本根與大全。本根大全安在？孟啟《本事詩》所叙“詩史”，所稱“推見至隱”，即是《春秋》書法特色之聚焦。學界於此，探論闕如，本文姑作嚆矢，聊以就教於方家同道。

(二) 杜甫詩史與《春秋》書法

以“詩史”稱述杜甫詩，自晚唐孟啟《本事詩》之後，至宋代以詩話、筆記說詩，“詩史”乃蔚為熱門之探討課題。考察涉及之層面，大概有三：曰詩補史闕、曰寄寓褒貶、曰史筆森嚴。¹⁹“杜工部似司馬遷”之命題，²⁰則又涵蓋“於序事中寓論斷”之比事見義書法（詳後）。²¹

趙宋三百餘年，號稱經學之復興時代。其中，《春秋》學與《易》學，並稱為顯學。《四庫全書總目》、《日講春秋解義》提要曾云：“說《春秋》者，莫夥於兩宋。”²²流風所及，自然影響詩歌之接受與反應，作品之解讀與詮釋。筆者曾考察宋代詩話六十種、宋人筆記三十二種，發現宋人持《春秋》書法為尺度，藉以論詩人之高下，品詩歌之優劣者頗多。尤其推崇微婉顯晦之曲筆，與孟啟《本事詩》所謂杜甫詩史，所提“推見至隱”之《春秋》書法，若合符節。²³

《孟子·離婁下》稱：“《詩》亡，而後《春秋》作。”²⁴可見《詩》與《春秋》，此消彼長，互為表裏。宋人論詩作文，《春秋》與《詩》往往相提並論，甚至彼此類

19 張高評：《詩史之體現》，《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臺南：成功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60—166。

20 張高評：《杜工部似司馬遷》，《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頁185—194。

21 白壽彝：《司馬遷寓論斷于序事》，《中國史學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80—107。

22 紀昀等主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卷29，頁592。

23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宋代詩學——以宋人筆記為例》，《宋詩話“以〈春秋〉書法論詩”》，《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頁55—128。

24 《離婁下》，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16，頁572。

比,如歐陽修(1007—1072)《論尹師魯墓志》所云:

《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冤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²⁵

歐陽修持《春秋》莊公三十二年書“子般卒”之義,類比《毛詩·君子偕老》之意。以為“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猶“《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尹師魯墓志》之銘文,其語愈緩,其意愈切,故切合詩人之旨。孟啟所提“詩史”之意識,與孟子所提《詩》與《春秋》相互連結之傳統,此中自有薪傳之關連。

宋人持《春秋》書法,評論詩歌之優劣得失,楊萬里(1127—1206)《誠齋詩話》可作代表。《左傳》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²⁶《誠齋詩話》據此,作為《詩》與《春秋》紀事之妙之衡量,如: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此《詩》與《春秋》紀事之妙也。……近世陳克詠李伯時畫《寧王進史圖》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是得謂為微、為晦、為婉、為不汙穢乎?惟李義山云:“侍宴歸來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可謂微婉顯晦、盡而不汙矣。²⁷

《誠齋詩話》說詩,稱引太史公曰論《國風》,好色而不淫,發乎情,止乎禮義;可以怨,可以誹,而無過不及,情與怨有所取捨節制。猶《春秋》其事、其文,或筆

²⁵ 歐陽修:《論尹師魯墓志》,曾棗莊:《全宋文》,(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頁454。

²⁶ 左丘明著,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27,頁465。

²⁷ 楊萬里:《誠齋詩話》,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頁139。

或削，或取或捨，多有準則，要皆以推見至隱爲依歸。楊萬里徵引《左傳》所載《春秋》五例之前四例：前三者，爲曲筆；惟盡而不汙，乃直書。相形之下，楊萬里較欣賞李商隱《龍池》詩微、婉、顯、晦之曲筆書法，而不贊同陳克《寧王進史圖》之直書不諱，蓋陳克詩病在顯暴君過，不知爲尊者諱恥。

《誠齋詩話》說詩，所引《春秋》五例，前四者涉及《春秋》“如何書”之“法”；其五懲惡而勸善，攸關“何以書”之“義”。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於此多所發明。其言曰：

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彰。²⁸

五例之前三例，微與顯，志與晦，婉與成章，皆因或筆或削，相反相成而見義。微、晦、婉，因削而不書，而有曲筆，有諱書。顯、志、成章，與第四例之盡、具文，皆筆而書之，爲直書見意。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發其蘊，互顯其義。²⁹ 凡此，皆《春秋》“如何書”之“法”。於是藉由“如何書”形而下之“法”，以體現形而上懲惡勸善之“義”。“義”，乃《公羊》學所謂“何以書”者。《左傳》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所謂《春秋》之稱，所謂“非聖人，誰能修之”，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轉相發明如上，又各舉例證，以實其說，最有功於《春秋》學之發揚。杜甫《祭遠祖當陽君文》所謂“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當指此等。清劉鳳誥《杜工部詩話》稱杜甫詩於杜預《春秋》、《左傳》學“運用神明，洵爲克承家學者也”，當於此中求之。錢鍾書《管錐編》，亦據“微婉顯晦”之《春秋》書法，以之闡發“《春秋》書法遂成史家楷模”，“言史筆幾與言詩筆莫辯”。³⁰ 由此觀之，杜甫“詩史”，與《春

28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卷首，頁5—6。

29 參考張高評：《〈春秋〉五例與〈左傳〉之忌諱敘事》，《國文天地》第35卷第5期（2019年10月），頁103—107。

30 錢鍾書：《左傳正義·杜預序》，《管錐編》（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年），頁164。

秋》書法關係之密切,可以想見。

《誠齋詩話》之外,宋代詩話,往往以《春秋》書法論詩,蔚為一代之風尚。其例尚多,如蔡條《西清詩話》,以“《春秋》書正月意”,解讀杜甫《人日》詩。黃徹《碧溪詩話》,考察《北征》詩,以為仿《春秋》“王正月”書法;杜詩涉及里居、名字、補官、遷徙,要皆“凡例森然,誠《春秋》之法”。張戒《歲寒堂詩話》,標榜微婉顯晦,以品題《哀江頭》,以為詩與《春秋》相表裏。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品論《北征》詩,以為切合“微而顯”之《春秋》書法。方深道《諸家老杜詩評》,錄存王深父評杜甫即事命篇之樂府歌行,多以美刺褒貶論斷杜甫“詩史”。劉克莊《後村詩話》,以為杜甫叙寫陳濤、潼關之敗,“直筆不恕”。³¹ 洪邁《容齋隨筆》,枚舉杜甫“直辭詠寄,略無避隱”之詩,如《兵車行》、《(前後)出塞》、《三吏》、《三別》、《哀王孫》、《麗人行》諸什以為證,而深憾我朝詩人不敢爾。³² 要之,書法、史法;史義、史術;史筆、詩心,其歸一揆。推本溯源,皆由屬辭比事之《春秋》叙事書法衍變而來。

杜甫詩學之研究,至清代諸家爭鳴,多有所得。清乾隆帝(1711—1799)御纂《唐宋詩醇》,品評杜甫《北征》詩,特提“行屬辭比事之法”一語。此一書法之提示,於《春秋》書法、叙事傳統、詩史研究、樂府叙事歌行之探討,頗有畫龍點睛之功,堪稱一大亮點。其言曰:

(杜甫)以排天斡地之力,行屬辭比事之法,具備方物,橫絕太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有五言以來,不得不以此為大文字也。³³

《唐宋詩醇》直指杜甫《北征》詩“行屬辭比事之法”,無異宣稱《北征》詩,實乃杜甫運化《春秋》書法而成。《禮記·經解》所稱“屬辭比事”之法,乃孔子筆削

31 宋代詩話,往往以《春秋》書法論詩,詳參張高評:《杜甫詩史與〈春秋〉書法——以宋代詩話筆記之詮釋為核心》,《人文中國學報》第16期(2010年9月),頁55—96。

32 洪邁著,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續筆卷二“唐詩無避諱”,頁239—240。參張高評:《〈容齋隨筆〉論〈左傳〉〈史記〉——以〈春秋〉書法詮釋為例》,《新宋學》第7輯(2019年10月),頁114—139。

33 《御選唐宋詩醇》(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10,頁7。

魯史記，作成《春秋》之歷史編纂學。其法，以義為主腦、為將帥，進而依違取捨素材，體現出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重或輕之書法來。事有主從、鉅細，故行屬辭比事之法，而見有無、詳略、重輕、異同、斷續、正反、前後之斟酌取捨。³⁴ 要之，屬辭或比事之法，至左氏傳《春秋》，出以歷史敘事，逐漸衍化為有無、詳略、重輕、異同、正反、虛實、繁簡、前後諸敘事藝術，此皆《春秋》藉由或筆或削，以見微辭隱義之方法，可以《北征》詩為範例，文繁不贅。

運行屬辭比事之法，作為敘事歌行、杜甫詩史之詮釋，最少必須經由三道程序：其一，敘事經由或筆或削，或取或捨之斟酌。其二，事之編比，體現為主從、我他、詳略、重輕、異同之精心安排；辭之連屬，表現為斷續、顯晦、虛實、繁簡、正反、前後之巧妙剪裁。其三，曲終奏雅，卒彰顯志，點醒敘事之旨趣，凸出作者之詩心、史義。清沈德潛（1673—1769）《說詩碎語》品評杜甫五古長篇：“有意本連屬，而轉似不相連屬者；敘事未了，忽然頓斷，插入旁議，忽然聯續，轉接無象，莫測端倪。此運《左》、《史》法於韻語中，不以常格拘也。”³⁵ 清方苞（1668—1749）論義法，有所謂“義以為經，而法緯之”者，³⁶ 即此是也。蓋意在筆先，以意運法，往往能外文綺交，而內義脈注，轉接自然，了無痕跡。語雖不接而意脈相接，如橫雲斷嶺之奇，《春秋》如此作成，杜甫敘事歌行，亦如此運作與表現。

屬辭比事之《春秋》教，為筆者近年關心投注之研究課題，已出版《屬辭比事與古文義法》、《比事屬辭與〈春秋〉詮釋學》兩本專著。而且，曾以此為研究視角，論證杜甫樂府敘事歌行，體現《春秋》書法之一斑。又撰有《杜甫詩史與〈春秋〉書法》一文，專取《春秋》書法，作為杜甫敘事歌行之研究視角：考察六十五則宋代詩話筆記，八則明清詩話之論述，借鏡兩宋《公羊》學、《左傳》學之理論，聯結經學、史學，與文學作一學科整合之探討。同時對比白居易、元稹、韓愈、李商隱等有關楊貴妃、馬嵬坡諸詩篇之敘事，以見宋人以《春秋》書法論詩

34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第七章《比事屬辭與方苞論古文義法》，頁332—364；第八章《方苞古文義法與〈史記評語〉》，頁395—438。

35 沈德潛：《說詩碎語》，丁福保：《清詩話》（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頁534。

36 方苞：《讀史·又書貨殖傳後》，《方望溪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2，頁40。

之一斑。³⁷

筆者又撰有《杜甫詩史、叙事傳統與〈春秋〉書法》一文，據杜甫所作《祭遠祖當陽君文》，見杜甫詩號為“詩史”者，除了“詩是吾家事”之外，其中自有《春秋》書法之薪傳在焉。章學誠《上朱大司馬論文》稱：“叙事實出史學，其源本於《春秋》‘比事屬辭’。”³⁸於是選擇杜甫詩集所作叙事歌行，關注其善陳時事之特質，持屬辭比事之《春秋》教，考察其中推見至隱之書法。就杜甫詩史與屬辭比事之叙事傳統，分三項考察之：一，屬辭比事，筆削顯義；二，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三，微婉顯晦，推見至隱。援舉杜詩相關作品，參考清人杜詩說解，交相論證。為中國傳統之叙事學，作嘗試性之探索。³⁹由此觀之，杜甫於安史之亂前後所作叙事歌行，孟啓所謂“推見至隱”之詩史者，自是中國叙事傳統之流亞。

三、六義比興、抒情傳統與杜甫詩史之推見至隱

(一) 孔子《春秋》與六義之比興

其事、其文、其義，為孔子作成《春秋》之三元素。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⁴⁰由此觀之，《春秋》之義，或筆或削，率由孔子所“竊取”（私為）。筆削之義，出於獨斷，裁自聖心，故雖孔子高弟游、夏之徒，亦不能贊一辭。孔子作《春秋》，或取捨史事，或損益辭文，或筆或削之際，而褒貶勸懲之指義出焉。指義與志意，雖相近而有已發未發之別：情意未發，愛憎好惡存於心；已而發為指義，則是非勸懲見於外。無論愛憎好惡、或是非勸懲，要皆抒情寫意之發用。

漢董仲舒（前 179—前 104）《春秋繁露》引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

37 張高評：《杜甫詩史與〈春秋〉書法——以宋代詩話、筆記之詮釋為核心》，《〈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臺北：里仁書局，2011年），頁322—359。

38 章學誠：《上朱大司馬論文》，《文史通義新編新注》，頁768。

39 張高評：《杜甫詩史、叙事傳統與〈春秋〉書法》，《人文中國學報》第28期（2019年6月），頁91—130。

40 《離婁下》，孟軻著，焦循疏：《孟子正義》，卷16，頁574。

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⁴¹所謂“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因事而著其是非得失”自有比興寄託之微意在。司馬遷私淑孔子，《史記》典範《春秋》，故《史記·太史公自序》叙上大夫壺遂問：“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司馬遷設爲問對，以比興應對之。⁴²持“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二語，正以《史記》之比屬見義，比況《春秋》之借事明義（詳後）。《詩·大序》以比興標示六義，屈原以美人香草象徵君臣，董仲舒、司馬遷以比興說解孔子作《春秋》。由此觀之，六義比興之作用，何其源遠流長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載司馬遷對上大夫壺遂問，論《春秋》之作用與價值，有所謂“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云云。⁴³司馬遷一方面代聖立言，認定孔子作《春秋》，在憑藉史事，以體現指義。一方面，亦典範《春秋》，認同理念，思繼志述事，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所謂“心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發憤著述，成就《太史公書》。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稱《史記》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⁴⁴蓋指司馬遷發憤著述，故叙事傳人，不能無身世之感，亦就六義之比興體制而言之。

晚清《公羊》學家皮錫瑞（1850—1908），著有《經學通論》一書，其《春秋》說，顯然上承孔子作《春秋》，董仲舒、司馬遷以比興說《春秋》之傳統。開宗明義，皮錫瑞即宣稱：“借事明義，是一部《春秋》大旨。”⁴⁵所謂“見之行事”，謂《春秋》之作，假借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孔子褒貶勸懲之義。孔子作《春秋》，或筆或削以示義，書法之顯晦、曲直、詳略、重輕，“其義，則丘竊取之。”褒貶勸懲，屬於“何以書”形上之義，若未講究表達藝術，等同載之空言。史事之編比，辭文之連屬，若講究“如何書”之法，則見之行事，深切著明。形而下之法，可以寄寓形而上之義。皮錫瑞稱“借事明義”，宋胡安國《春秋傳序》所謂：“行事然

41 董仲舒著，蘇輿注：《俞序第十七》，《春秋繁露義證》，（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卷6，頁111。

42 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太史公自序》，《史記會注考證》，卷130，頁1370—1371。

43 同上注，頁1370。

44 魯迅著，顧農講評：《司馬相如與司馬遷》，《漢文學史綱要》，（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頁73。

45 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21—22。

後見其用”，此言得之。其用云何？褒貶勸懲之義而已！

前乎此者，清代乾隆、嘉慶年間，章學誠提倡《春秋》之教，雖未有專篇闡說，然精言妙理見諸散章者，於《春秋》教發明頗多。⁴⁶ 其中，《史德篇》一再標榜：“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之話語，提示“六義比興”與“《春王正月》之書”（《春秋》）間之密切關聯。其言畫龍點睛，警策提撕，實發人之所未發，言人之所未言：

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⁴⁷

梁劉勰《文心雕龍·比興》云：“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蓄積以斥言，興則環譬以寄諷。”⁴⁸興體，因起情而立；比體，由附理以生。起情附理，托喻成章，謂之比興。朱熹《詩集傳》稱：“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⁴⁹通“六義比興”之旨者，往往緣物取興，因事託義，引類譬喻，發揮《詩》、《騷》以來的比興傳統，以之創作文學，以之講學經義。孔子作《春秋》，固緣事而屬辭，復因其事、其辭以寄意；後人研治《春秋》，則即辭以觀義。

比興之概念，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之比興，出於感發興情、見諸微婉顯

46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章學誠之〈春秋〉教：史學、敘事、古文辭與〈春秋〉書法》，《中山人文學報》2014年第36期，頁31—58。《屬辭比事與〈春秋〉之微辭隱義——以章學誠之〈春秋〉學為討論核心》，《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17輯（2015年10月），頁152—180。

47 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史德》，《文史通義新編新注》，頁267。

48 劉勰著，范文瀾注：《比興》，《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卷8，頁601。

49 朱熹《詩集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91年3月），頁1、4。

晦。《文史通義·史德》所謂“必通六義比興之旨，然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類此。杜甫品評元結《春陵行》，稱為“比興體制”；白居易自作諷諭詩，目為“美刺比興”，肯定杜詩之風騷比興；而杜甫詩崇尚興寄諷諫，亦是此義。⁵⁰ 敘事雖為六義之“賦”，不妨“以言內之實事，寫言外之重旨”，可以兼比興而一之。⁵¹ 《詩》主文而譎諫，《春秋》曲筆諱書，杜甫敘事歌行，多興寄深微，而微婉顯晦之旨意，往往見於言外。

狹義之比興，反映現實，針砭時弊，妙用比興寄托之法，以之吟詠情思。唐白居易《禽蟲十二章序》所謂：“《莊》、《列》寓言，《風》、《騷》比興，多假蟲鳥以為筌蹄。”⁵² 托物寓情，婉而成章，著重諷喻、寄託、影射諸表現手法，此即文學創作論之比興寄託。⁵³ 漢王逸《楚辭章句》所謂：“《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⁵⁴ 劉知幾《史通·敘事》稱：“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⁵⁵ 錢鍾書《管錐編》論寄託，稱“詩中所未嘗言，別取事物，湊泊以合，所謂‘言在于此，意在于彼’”。⁵⁶ 《莊子》、《史記》以寓言寄意，《詩》、《騷》寓託香草美人，詠史、詠物諸什則以之興寄託諷，要皆狹義之比興。衡諸杜甫所作敘事歌行，號稱“詩史”者，運用比興，亦自有廣義狹義之分野。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強調心術貴在平日所養，故訓釋“興”字，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好善惡惡之心，即是《左傳》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所謂“懲惡而勸善”之義，乃“《春秋》之稱（權衡）”，非聖人誰能修之者。《史記·太史公自序》所稱“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云云，要皆指《春秋》好善惡惡之心。孔子作

50 陳伯海：《正本篇·唐詩的風骨與興寄》，《唐詩學引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6年），頁11—14。又，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四章《轉折時期》，頁109—112；第七章《中唐文學思想》，頁256—264。

51 劉熙載著，徐中玉、蕭華榮校點：《藝概·賦概》，《劉熙載論藝六種》，（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卷3，頁95。

52 《禽蟲十二章序》，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卷37，頁2584。

53 徐中玉主編，陳謙豫副主編：《意境·典型·比興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282—296。

54 王逸注，洪興祖補注，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3。

55 《敘事》，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卷6，頁178。

56 錢鍾書：《毛詩正義·狡童》，《管錐編》（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年），冊1，頁108。

《春秋》所竊取之義，即是懲惡勸善，賢賢賤不肖；後人講述《春秋》，切類以指事，依微以擬議，自然興起好善惡惡之心，誠如《文史通義·史德》所云。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春秋》）。《詩》、《騷》與《春秋》，互為表裏，亦由此可見。

（二）杜甫敘事歌行與詩史之推見至隱

漢王逸《離騷·序》稱：“《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屈原繼承并發揮《詩經》之比興傳統，以比興表情達意，以香草、善鳥來象徵詩人之品德修養，以靈修、美人象徵君王與忠賢。此一《詩》、《騷》之比興傳統，源遠流長：於《春秋》，為“借事明義”之大旨；於《左傳》，轉化為微婉顯晦之書法；於《史記》，蛻變為“無韻之《離騷》”；於杜甫詩史，則成為“推見至隱”之興寄深微。追本溯源，其要多歸於六義之比興。

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詩序云：“覽道州元使君《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⁵⁷葛曉音（1946—）教授《論杜甫的新題樂府》以為：杜甫稱元結《春陵行》和《賊退示官吏》，為“復見比興體制”，說明杜甫認同漢魏樂府古詩運用比興之手法，和“憂黎庶”之精神。杜甫所謂“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與陳子昂《修竹篇·序》所云漢魏興寄之意並無不同。⁵⁸要之，所謂比興體制、比興寄託、興寄云云，其手法與成效，視《春秋》推見至隱，並無太大之歧異。

杜甫所謂“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若比物聯類，則司馬遷《史記》所述《春秋》學，頗有近似處。《史記·匈奴列傳》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是微言、晦書、忌諱之辭，多出於不得已。《十二諸侯年表序》稱：“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文辭不可以書見，是出於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顧忌。《司馬相如列傳》云：“《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因此，孔子作《春秋》，採行推見至隱之書法，亦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於是，曲筆隱微遂成《春秋》書法之

57 《同元使君〈春陵行〉》，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9，頁1691。

58 葛曉音：《論杜甫的新題樂府》，《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第1期，頁197—204。

一。清浦起龍(1679—1762)著《讀杜心解》，以《春秋》書寫權衡杜詩；稱杜甫詩“玄、肅之際多微辭。讀者要屏去逆料意見，腹誹意見，追咎意見。老杜愛君，事前則出以憂危，遇事則出以規諷，事後則出以哀傷。”⁵⁹唐朝玄宗、肅宗之際，詩人杜甫身經目歷，當下筆而書之，遂涉及近代、現代、當代之人與事。猶孔子作《春秋》，書寫定公、哀公時期人事，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為斟酌史事真實與明哲保身，故往往出以忌諱敘事、微辭書寫。杜甫詩歌體現微辭隱義，浦起龍《讀杜心解》，有絕佳之提示。

《春秋》“推見至隱”，《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所稱，究竟指涉如何？以《左傳》所載《春秋》五例而言，見（同現，顯現之意）、志、盡、成章，為明筆直書；隱，猶微、晦、婉，多為曲筆諱書。直書與曲筆，為《春秋》修辭學之兩大表達方式。《春秋》或“切當世之文而罔褒”，或“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故忌諱敘事，多揚棄明筆直書，轉化為曲筆諱書。《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稱：《春秋》“推見至隱”，此之謂也。⁶⁰杜甫所謂“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皮錫瑞《春秋通論》所謂“借事明義，是一部《春秋》大旨”，可於此中求之。

杜甫所作歌行，約 90 餘首。日本學者稱：杜詩之歌 33 首，行 51 首。⁶¹“行”詩與新題樂府，關係最為密切。論其內容，多以諷刺時事、傷民病痛為主。安史之亂，杜甫身經目歷，現地創作，葛曉音教授指出：如《兵車行》、《麗人行》、《貧交行》、《沙苑行》、《哀王孫》、《悲陳陶》、《悲青坂》、《塞蘆子》、《哀江頭》、《洗兵馬》、《三吏》、《三別》、《留花門》、《大麥行》、《光祿坂行》、《苦戰行》、《去秋行》、《冬狩行》、《負薪行》、《最能行》、《折檻行》、《虎牙行》、《錦樹行》、《自平》、《歲晏行》、《客從》、《蠶谷行》、《白馬》諸詩，多反映時事於新題樂府中，凡 32 首。⁶²除了葛教授所列之外，它如《義鵲行》、《丹青引贈曹將軍霸》、《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天育驃圖歌》、《彭衙行》、《瘦馬行》、《杜鵑行》、《杜鵑》、《戲作花卿歌》、《贈花卿》、《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行》諸詩，亦

59 浦起龍：《讀杜提綱》，《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70年），卷首，頁62。

60 張高評：《〈史記〉忌諱敘事與〈春秋〉書法——以征伐匈奴之相關人事為例》，《嶺南學報》第12輯（2019年12月），頁19—59。

61 松原朗：《杜甫的歌行》，《中國詩文論叢》第四集，日本中國詩文研究會，1985年。

62 葛曉音：《論杜甫的新題樂府》，頁198。

皆叙寫時事之歌“行”詩。大抵作於“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之際，孟啟《本事詩》所謂“《春秋》推見至隱”，杜甫所謂“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者。

日本松原朗(1955—)以為：歌詩與行詩，杜甫所作頗見分野：“歌”詩，較多表現個人生活中的感慨；而“行”詩，則較多政治批判性的內容。此大概言之，夷考其實，並不盡然。如《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天育驃圖歌》、《戲作花卿歌》諸作，亦諷諭時政，主文而譎諫，並非表現個人生活感慨。杜甫所作歌行，既然批判政治，不免諷刺當代時事，關心民心疾苦，於是《詩·大序》所云“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之主文譎諫；《左傳》所提“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之《春秋》五例；王逸《離騷序》稱《離騷》：“依《詩》取興，引類譬喻”之美刺比興，《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定、哀之際：“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之忌諱叙事，其歸一揆。劉勰《文心雕龍》稱比興為：“附意切事，托諭成章”；杜甫所謂“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孟啟《本事詩》所謂“《春秋》推見至隱”；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所謂：“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皮錫瑞《春秋通論》所謂“借事明義，是一部《春秋》大旨”云云，考其指涉，大抵相通相融，可以相互發明。凡所謂“比興”，不過，有廣義、狹義之分而已。

清畢沅(1730—1797)為《杜詩鏡銓》作序，謂杜甫“吸群書之芳潤，擷百代之精英，抒寫胸臆，鎔鑄偉辭。以鴻博絕麗之學，自成一家之言。氣格超絕處，全在寄託遙深，醞釀醇厚。其味淵然以常，其光油然以深，言在此而意在彼，欲令後之讀詩者，深思而自得之。”⁶³杜甫詩運用比興體制，所作多寄託遙深，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蓋深得六義比興，通曉“春王正月”之書法者也。

四、六義比興、抒情傳統與杜甫叙事 歌行之微婉頓挫

孔子《春秋》，以或筆或削見義，故微辭隱義難明。《朱子語類·春秋綱領》

63 杜甫著，楊倫注：《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卷首，頁1。

云：“聖人且據實而書之，……蓋有言外之意”，“《春秋》卻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道理去折衷”。⁶⁴ 朱熹稱《春秋》“都不說破”，“蓋有言外之意”，此與詩歌語言之特質何以異？與“都不說破”，“蓋有言外之意”之《春秋》書法，可以相互發明。都不說破、蓋有言外之意之《春秋》書法，天寶十五載之正月（756），杜甫所作《春望》，⁶⁵可作代表。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755），安祿山反。十五載六月（756），攻陷洛陽。同年，十二月，潼關失守，長安相繼淪陷，唐明皇倉皇西狩。杜甫身陷長安，自處歷史現場，蒿目時艱，悵然有懷。所作《春望》五律，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體，堪稱“詩史”之翹楚。詩曰：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⁶⁶

宋人所作詩話、筆記，標榜“以《春秋》書法”說詩評詩，如司馬光、許顥、陳善、胡仔、張戒、羅大經、魏慶之、蔡正孫諸家所言，多舉《春望》為例。先看司馬光（1019—1086）《續詩話》評論《春望》：

古人為詩，貴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徧舉。⁶⁷

依《春秋》五例，敘事書法分曲筆和直書二者。《春望》首二句，敘事若直書其事，

64 《春秋綱領》，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 83，頁 2145、2149、2152。

65 《春望》，杜甫著，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校：《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卷 1，頁 157。

66 《春望》，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 4，頁 321。

67 司馬光：《續詩話》，何文煥：《歷代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277。

當如：天寶十四載十一月，朔方節度使安祿山作亂。十五載六月，潼關失守，明皇幸蜀云云，則據事直書，具文見意，一目瞭然，所謂盡而不汙。然杜甫創作《春望》，詩人之情懷，恰值萬方多難之秋，有所不忍，為君國諱，遂運用曲筆諱書之書法，寫下“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二語。就屬辭比事之《春秋》教而言，杜甫《春望》首二句，選擇“國破”與“山河在”二事，經由對比敘事，以見除了“山河在”之外，國家已殘破不堪，已物是人非，司馬光《續詩話》所謂“明無餘物矣”。其次，再凸顯“城春”與“草木深”二景，進行類比敘事，於是徒見“草木深”，而未見熙來攘往之京華繁榮景象，司馬光《續詩話》所謂“明無人迹矣”。詩人鋪陳詩材，與史家編比史事，筆削去取之際，脈絡自有相通之處。

元趙汭(1319—1369)《春秋屬辭》，論孔子作《春秋》，假筆削以行權，其中“有書，有不書”；與詩人揀選詩材以敘事寫情相通。其言曰：

孔子作《春秋》……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其所書者則筆之，不書者則削之。其能參考經傳，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以其所不書，推見其所書者，永嘉陳氏(傅良)一人而已。⁶⁸

南宋陳傅良(1038—1203)著《春秋後傳》，說《春秋》義昭筆削，為元代趙汭《春秋屬辭》所標榜，所謂“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以其所不書，推見其所書”。或筆或削之間，足以互發其蘊；或書或不書之際，可以互顯其義。推想孔子假筆削以行權，大抵如此。

試持以說杜甫《春望》詩首二句，但叙“國破山河在”，則知“明無餘物矣”。但叙“城春草木深”，則見“明無人迹矣”。孔子假筆削以行刺譏褒諱挹損之權，誠如清莊存與(1719—1788)《春秋正辭》所云：“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⁶⁹ 或筆或削相形，或書或不書相較，可以體現微辭隱義。司馬光說杜甫《春望》詩，稱“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亦忌諱敘事之常法。

68 趙汭：《假筆削以行權第二》，《春秋屬辭》，(臺北：大通書局，1970年)，卷8，頁14801。

69 莊存與：《莊侍郎春秋正辭·春秋要指》，阮元編：《皇清經解》，(臺北：復興書局，1972年)，卷387，頁8443。

杜甫作《春望》詩，出於感發興情、見諸微婉顯晦，所謂廣義之比興也。

考察杜甫敘事歌行，出於“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者頗多。今以杜甫詩史為指歸，以杜甫敘事歌行為範圍，取其有《春秋》筆削見義、六義比興者，如《麗人行》、《哀江頭》、《戲作花卿歌》、《贈花卿》、《丹青引贈曹將軍霸》、《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諸什，闡說論證如下：

(一)《麗人行》

《麗人行》，約作於天寶十二載(753)春三月，時杜甫年四十二歲。一年九個月之後，安史之亂發生。此詩叙寫諸楊遊宴曲江之事，一片奢華綺麗，猶如暴風雨前夕之景象。所叙故事，與《明皇雜錄》、《楊太真外傳》、《舊唐書》相對照，大抵為實錄，與信史相去不遠。⁷⁰ 所不同者，出於敘事歌行之體，托物寓情，興寄諷諭；為尊者諱，微婉顯晦，美刺多見於言語之外。其詩曰：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
 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盃葉垂鬢脣。背
 後何所見？珠壓腰褷穩稱身。(足下何所著？紅蕖羅襪穿鞢銀。)就中
 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
 箸厭飫久未下，鑿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鞞不動塵，御厨絡繹送八珍。
 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
 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
 相嗔。⁷¹

杜甫《麗人行》，鋪陳皇親國戚之遊春氣象，遊宴之豪貴驕奢。特寫秦國夫人、虢國夫人之姿容服飾，妖冶艷麗，卻以“麗人”二字隲括之，《杜詩詳注》美其“詩

70 司馬光奉敕編集，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臺北：粹文堂出版社，1975年)，卷216，頁6920。

71 《麗人行》，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2，頁156。

家含蓄得體處”。⁷² 宋趙次公《杜詩先後解》稱：“鞍馬之多，必至觸揚花而覆白蘋。青鳥，應如鸚鵡之類，豢養馴熟，飛銜紅巾。此正借西王母以青鳥為使名之，且以托言昵戲之事矣！”⁷³ 楊花、白蘋、青鳥、紅巾，以之托言昵戲之事，六義比興，妙在不說破，意在言外，絕妙諷諭。明鍾惺《詩歸》所謂“本是風刺，而詩中直叙富麗。”清施補華(1835—1890)《峴傭說詩》云：“前半竭力形容楊氏姊妹之遊冶淫佚，後半叙國忠之氣噉逼人，絕不作一斷語，使人意外得之。”⁷⁴ 清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論叙事之法，有所謂“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⁷⁵ 於杜甫《麗人行》詩，即可悟“於序事中寓論斷”之妙。

案諸《春秋》之教，比事，即是排比相近或相反之事類，都不說破；讀者比事以觀，自然浮現言外之意。《春秋》書法之一，在“為尊者諱恥”，此中有之。安史之亂，楊氏實為禍階。杜甫以詩史叙事，運以《春秋》書法，多為尊者諱，“既不可直陳，又不敢曲諱”；於是詩史叙事，“但舉一事而眾端可以包括”。⁷⁶ 《哀王孫》、《哀江頭》、《麗人行》，其較著者焉。《穀梁傳》釋《春秋》，有舉重、舉輕之辨。蓋《春秋》書事非一，既不可勝譏，故擇其重者而譏之；亦不可勝貶，故擇其重者而貶之。重輕詳略之筆削，即是《春秋》書法之體現。⁷⁷ 杜甫《麗人行》，信有此妙。

杜甫《麗人行》詩之善諷處，在微指椒房，直言宰相，曲筆直書兼而有之。其殊勝處，則在“為尊者諱恥”之《春秋》書法。⁷⁸ 試想：諸楊姊妹兄長，如此驕縱、淫侈、奢華、跋扈，孰令致之？不皆緣於明皇之寵祿太過乎？然帝王尊者，不可直斥其非，是以顧左右而言它：曲筆諱飾，但鋪敘秦國夫人、虢國夫人冶容、

72 《麗人行》，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2，頁157。

73 《麗人行》，杜甫著，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校：《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卷3，頁67。

74 施補華：《峴傭說詩》，丁福保編：《清詩話》，頁985。

75 《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26，頁1429。

76 黃生著，徐定祥點校：《杜詩說》，（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卷3，頁87。

77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修辭學—錢鍾書之修辭觀》，《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頁509—556。

78 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卷9，頁114。

諸楊春日遊宴之樂而已。楊太真身份尊貴，故《麗人行》“但言輦前才人”，亦側筆見態，顧左右而言之，為尊者諱也。宋張戒《歲寒堂詩話》推崇之，以為“此意尤不可及”，蓋得《春秋》家忌諱敘事之教，詩家語含蓄蘊藉之妙。

比事與屬辭，為《春秋》書法之兩大脈絡。“麗”字，為《麗人行》前半篇之詩眼，亦屬辭約文之所在。就比事而言，排比遊女之麗、丰神之麗、體貌之麗、服色之麗，以及通體華麗諸事，皆以相近相類而比事見義。然後約文屬辭，以“麗人”二字概括之，以為詩題，遂成一篇體物瀏亮之賦體傑作。⁷⁹ 屬辭刻鏤之精工，亦令人贊賞不置。除類比敘事之外，《麗人行》接續以對比敘事。個中微妙，清蔣金式（弱六）通考全詩佈局，為之拈出：“美人相、富貴相、妖淫相後，乃現出羅剎相。”⁸⁰ 美人相、富貴相，為類比敘事；妖淫相、羅剎相，為對比敘事。編比史事，或類比，或對比，多可以體現詩心史義，於此可見。

細案《麗人行》一詩，抑揚予奪之際，確實存在“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之現象，⁸¹ 故每出於微辭與曲筆，為尊長諱過、諱恥也。清仇兆鰲（1638—1717）《杜詩詳注》引盧元昌曰：“中云‘賜名大國虢與秦’，後云‘慎莫近前丞相嗔’，玩此二語，則當時上下驕淫，瀆倫亂禮，已顯然言下矣。”又引朱注云：“國忠與虢國，為從兄妹。不避雄狐之刺，故有‘近前丞相嗔’之語，蓋微辭也。”⁸² 前文提及歐陽修《論尹師魯墓志》云：“《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吾於杜甫《麗人行》敘事歌行，曲筆諱書處，亦云。

清高宗《唐宋詩醇》品評《麗人行》，謂“託刺微婉，意指遙深，較《衛風（鄘風）·君子偕老篇》，則微而顯矣。”案：“微而顯”，為《春秋》五例之首。杜甫敘事歌行，寓含《春秋》書法可見。《讀杜心解》評云：“無一刺譏語，描摹處語語刺譏。無一概歎聲，點逗處聲聲慨歎。”⁸³ 顧炎武所謂“于序事中寓論斷”，此《春秋》藉比事以體現文心史義之方法，而於杜甫《麗人行》見之。

79 王嗣奭：《杜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24。

80 《麗人行》，杜甫著，楊倫輯：《杜詩鏡銓》，卷2，頁102。

81 《十二諸侯年表序》，司馬遷撰，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14，頁235。

82 《麗人行》，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2，頁161。

83 《麗人行》，浦起龍：《讀杜心解》，卷2，頁229。

清郭曾炘(1855—1928)《讀杜笱記》，亦以爲“此詩之妙，在於意在言外”。⁸⁴ 託刺微婉，所以能意指遙深者，蓋吟詠情思，妙用興寄，長於運化六義之比興，因而富於意在言外之妙。唐孟啟《本事詩》稱：“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

所謂“推見至隱”，《麗人行》一詩，已不疑而具。

(二)《哀江頭》

至德二載之春(757)，杜甫年四十六歲。身陷長安淪陷區，目覩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哀江頭》之詩。因玄宗與貴妃時常遊幸曲江，於是興哀于馬嵬坡之事，專爲貴妃而作，故以《哀江頭》爲名。詩曰：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
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
羣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
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域北。⁸⁵

明黃生(1622—1696)《杜詩說》云：“詩意本哀貴妃，不敢斥言，故借江頭行幸處，標爲題目耳。”⁸⁶ 屬辭命題，有爲尊者諱書者，即此是也。由此觀之，《哀江頭》自是因詩取興，引類譬喻；附意切事，托諭成章；借事明義，推見至隱；諷諭政治，主文譎諫之作。杜甫所謂“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也。其中，亦兼用錢鍾書《管錐編》所謂“言在於此，意在於彼”之興寄。如清錢謙益箋注《杜工部集》稱：“清渭劍閣寓意于上皇貴妃也。玄宗之幸蜀也，出延秋門，過便橋，渡渭，自咸陽望馬嵬而西。則清渭以西，劍閣以東，豈非娥眉宛轉、血汗遊魂之處

84 《麗人行》，郭曾炘：《讀杜笱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37。

85 杜甫著，仇兆鰲注：《哀江頭》，《杜詩詳注》，卷4，頁329。

86 同上注。

乎？故曰‘去住彼此無消息’。”⁸⁷此《詩》、《騷》依詩取興，引類譬喻之法。

杜甫所作敘事歌行，體現《春秋》書法者，宋人詩話筆記已多所提示。⁸⁸ 除前文引述楊萬里《誠齋詩話》，以“微婉顯晦、盡而不汙”之《春秋》書法論詩外，張戒《歲寒堂詩話》尤其大張旗鼓，標榜曲筆諱書、微婉有禮、宛在目前、寄于言外諸詩美與詩藝。如杜甫《哀江頭》詩，張戒評之曰：

楊太真事，唐人吟詠至多，然類皆無禮。太真配至尊，豈可以兒女語瀆之耶？惟杜子美則不然，《哀江頭》云“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不待云“嬌侍夜”“醉和春”，而太真之專寵可知；不待云“玉容”“梨花”，而太真之絕色可想也。至于言一時行樂事，不斥言太真，而但言輦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墜雙飛翼”；不待云“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時行樂可喜事，筆端畫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豈終極”，不待云“比翼鳥”“連理枝”；“此恨綿綿無盡期”，而無窮之恨，《黍離》麥秀之悲，寄于言外。題云《哀江頭》，乃子美在賊中時，潛行曲江，睹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詞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禮，真可謂得詩人之旨者。《長恨歌》在樂天詩中為最下，《連昌宮詞》在元微之詩中乃最得意者，二詩工拙雖殊，皆不若子美詩微而婉也。元白數十百言，竭力摹寫，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⁸⁹

安史之亂，太真實為禍階，而禍起於專寵行樂。明皇貴為天子，杜甫叙及宮幃大內之事，固當出以“為尊者諱恥”之《春秋》書法。何況，如張戒《歲寒堂詩話》所言：“太真配至尊，豈可以兒女語瀆之耶？”然清王嗣奭曰：“公追遡亂根，自貴妃始。故此詩直述其寵幸宴遊，而終之以血污遊魂。深刺之，以為後鑑也。”⁹⁰

87 《哀江頭》，錢謙益：《錢注杜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卷1，頁43。

88 張高評：《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貳《〈春秋〉書法與宋代詩學——以宋人筆記為例》，頁59—91。參《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以〈春秋〉書法論詩》，頁100—128。

89 張戒《歲寒堂詩話》，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卷上，頁457。

90 《哀江頭》，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4，頁332。查考明王嗣奭《杜臆》，卷二《哀江頭》，文字稍異，而指義不殊。

此詩既不便直陳，又不得不曲筆諱書，於是感發興情，出於風騷美刺，見諸比興體制，切合微婉顯晦之《春秋》書法。故半露半藏，若悲若諷如是。張戒《歲寒堂詩話》稱《哀江頭》：“其詞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禮，真可謂得詩人之旨者。”較之白居易《長恨歌》，元稹《連昌宮詞》之直書其事，不為尊者諱，皆不若子美詩微而婉也。信然！

《春秋》之義，昭乎筆削；而筆削之義，不僅比事以見始末，屬辭約文以成章法而已。以義則孔子“竊取之”之旨觀之，“其中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者”。⁹¹ 簡言之，詳略、異同、重輕、忽謹之去取從違，可以體現出筆削之指義，藝術之匠心。據此《春秋》書法，以考察杜甫《哀江頭》，詩篇前幅三分之二，詳叙重寫貴妃遊苑，極言盛時之樂；後幅三分之一，略叙輕點馬嵬西狩之痛，深致亂後之悲。歡樂事與悲涼景兩相映襯，比事屬辭之對比叙事體現如是，於是撫今追昔，睹物思人之幽情，油然而生，故淋漓頓挫如此。

宋孫奕《履齋示兒編》稱：“杜公傷唐末之離亂，故作詩史；於歌行，每以嗚呼結其篇末。”此猶歐陽修感傷五代之離亂，而《五代史》卒章每“嗚呼”興歎者然。孫奕臚舉杜甫《析檻行》、《冬狩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天育驃騎歌》諸詩為例。尤其凸顯《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每章皆以“嗚呼”作結，以為“公獨有傷今思古之意”。⁹² 歌行出於“嗚呼”作收者，蓋杜公心有鬱結，不能通其道，故發抒於情性如此，此猶小焉者。杜甫歌行若運以六義比興，則茹遠紆徐，韻味無窮，富於沈鬱頓挫之妙。此其大者、偉者、有味者。

黃生《杜詩說》評《哀江頭》，以為長於叙事：“善述事者，但舉一事，而衆端可以包括，使人自得于言外。若纖悉備記，文愈繁而味愈短矣。”⁹³ 宋蘇轍曾曰：“《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費數百言而後成歌，杜公言太真之被寵，則‘昭陽殿裏第一人’足矣。言富貴，則‘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足

91 《答客問上》，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頁 252。

92 孫奕：《履齋示兒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10，頁 482。

93 《哀江頭》，黃生著，徐定祥點校：《杜詩說》，（合肥：黃山書社，1994 年），卷 3，頁 87。

矣。言馬嵬之死，只‘血污遊魂歸不得’足矣。”⁹⁴案：《春秋》書事非一，或不可勝譏，故擇其重者而譏之；或亦不可勝貶，故擇其重者而貶之。⁹⁵《春秋》之書法，往往錄其重者，錄其猶可得而言者；其輕者略之，其不可者諱之。⁹⁶文學創作有以偏概全之法，《文心雕龍·物色》示以少總多之術，蘇軾《傳神記》倡“頰上三毫，得其意思所在”之說。凡此，皆“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或偏載略取，或舉輕明重，此皆或筆或削書法之流亞。

《哀江頭》以一句叙寫一事，傳神阿堵，得其意思所在，文約而義豐，事稱而辭舉，此即舉重明輕、錄重錄可之《春秋》書法。劉知幾著《史通》，《叙事》篇標榜尚簡用晦，所謂“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⁹⁷或筆或削之《春秋》書法，此中有所體現。由此觀之，《哀江頭》之叙事，頗得或筆或削《春秋》書法之薪傳。《本事詩》稱杜甫詩為“詩史”，標榜“推見至隱”之《春秋》書法，《哀江頭》有之。

(三)《戲作花卿歌》、《贈花卿》

《戲作花卿歌》、《贈花卿》二詩，唐肅宗上元二年(761)，杜甫年五十，作於四川成都。花卿，即四川牙將花驚定，事詳《舊唐書·肅宗紀》、《舊唐書·高適傳》。《戲作花卿歌》，本述花卿，題曰戲作，中有比興美刺之諷意焉。

宋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跋》稱揚杜甫詩：“比興發於真機，美刺該夫衆體。白唐迄今，餘五百年，為詩學宗師，家傳而人誦之。”⁹⁸宋蔡夢弼箋評杜詩，持比興與美刺相提並論，以為發於真機，該夫衆體，誠一針見血之論。試看杜子美《戲作花卿歌》、《贈花卿詩》，陳善、胡仔、魏慶之、蔡正孫諸家之評論，可見一斑。

依據《舊唐書》所載《肅宗傳》、《高適傳》：上元二年，梓州刺史段子璋謀

⁹⁴ 《哀江頭》，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四，頁332。

⁹⁵ 參考拙著：《〈春秋〉書法與修辭學——錢鍾書之修辭觀》，《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頁522—527。

⁹⁶ 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21。

⁹⁷ 《叙事》，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6，頁173。

⁹⁸ 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跋》，仇兆鰲注：《杜詩詳注》，頁2249。

反,成都猛將花驚定平賊有功。叛逆既誅,花卿恃勇,剽掠東蜀,蜀中患之。杜甫《戲作花卿歌》,反應當代之史實,妙在“于序事中寓論斷”,當作於此時。其詩曰: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
 緜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
 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
 東都?⁹⁹

杜甫以亦莊亦諧之筆,創作敘事歌行之體。詩中塑造花卿之人物形象,以“用如快鶻”“見賊唯多”,速寫輕快颯爽之將軍形象。“緜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二句,呼應花卿輕快俐落手段,敕平僭越叛亂,猶如摧枯拉朽。更以“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二句,特寫其壯氣勃勃,猛驚出群之鮮明形象。“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花驚定撥亂反正,平賊之功值得大書特書,故褒崇有加。花卿之勇猛駭俗,功勳絕世,杜甫一路推揚贊賞不置。一筆而進退公卿,此即《春秋》褒貶勸善懲惡、賞功罰罪之書法。

然詩篇將終,卒章顯志,卻順理成章,作一轉語云:“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東都?”此乃將抑先揚,欲貶先褒之書法。比興體制之沈鬱淋漓,頓挫生姿,此中可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以為:“想花卿當時在蜀中,雖有一時平賊之功,然驕恣不法,人甚苦之。故子美不欲顯言之,但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語句含蓄,蓋可知矣。”¹⁰⁰《春秋》褒譏,寓於書法,魏慶之《詩人玉屑》、蔡正孫《詩林廣記》本之,亦以為言。¹⁰¹

詩題曰“戲作”,自有諷刺之意味在。詩篇最後兩句,卒章顯志,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評為“語句含蓄”。此猶《離騷》、《楚辭》有“亂曰”,如曲終奏雅,實

99 《戲作花卿歌》,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0,頁844。

100 胡仔著,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卷14,頁90。

101 魏慶之:《詩人玉屑》,(臺北:世界書局,1971年),卷10,頁210。蔡正孫著,常振國、絳雲校點:《詩林廣記》(前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2,頁28。

有文外曲致之作用。案：《春秋》書法，有顯筆、明書，亦有晦書、暗筆。《春秋》五例，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明暗交寫，顯晦並書，《春秋》微辭隱義之表述，往往見之。清楊倫（1747—1803）《杜詩鏡銓》評《戲作花卿歌》末二句：“末語刺之，意甚微婉”，¹⁰²即以《春秋》書法品評杜詩。《春秋》筆削魯史記，微辭隱義多見於文字之外。微辭隱義，究竟如何考求？元趙汭《春秋屬辭》提示：“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以其所不書，推見其所書”，言簡意賅，可法易行。《戲作花卿歌》卒章末句，但書“天子何不喚取守東都？”杜甫“其所不書”者為何？此一言外之意，留予讀者若干想像空間。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稱：“蓋以東都之命見召，則驚定既不疑懼，而蜀中可免其患。”調虎離山，一石二鳥，對待梟雄猛將，不失為奇策。然此不過杜甫“戲作”，而微婉諷刺，意在言外。

《贈花卿》詩，為《戲作花卿歌》之姊妹篇，杜甫同時作於上元二年。其詩風華流麗，有頓挫抑揚之妙。詩曰：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¹⁰³

杜甫《贈花卿》詩，起承轉合，圓美流動。明焦竑（1540—1620）以為：杜公所作絕句百餘首，品評此詩為壓卷之作。花驚定平定蜀亂有功，遂恃功驕恣，僭用天子之禮樂，故杜甫作詩譏之。宋陳善《捫蝨新話》所謂“當時花卿跋扈不法，有僭用禮樂之意。子美所贈，蓋微而顯者也。不然，豈天上有曲，而人間不得聞乎？”¹⁰⁴案：“微而顯”，典出《左傳》成公十四年“君子曰”，為《春秋》五例之首，乃曲筆之屬辭，忌諱叙事之書法。明唐汝詢《唐詩集》亦稱：“少陵語不輕造，意必有託。”舉本詩“天上”句為例，以為諷刺之意居多。¹⁰⁵以此觀之，《贈花卿》一詩，涉及忌諱叙事，為杜甫以《春秋》書法為詩，“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之

102 《戲作花卿歌》，杜甫著，楊倫注：《杜詩鏡銓》，卷8，頁368。

103 《贈花卿》，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0，頁846。

104 陳善：《捫蝨新話》（香港：龍門書店，1967年），卷3，頁210。

105 陳伯海主編：《唐詩彙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冊上，頁1157。

代表作,已經陳善等確認無誤。君子贈人以詩,惟語意諷刺,含蓄不露,有得於六義比興之旨。清楊倫《杜詩鏡銓》評後二句:“似諛似諷”。此《詩大序》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主文而譎諫之作也。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稱孔子筆削魯史記而成《春秋》,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而反之正,於是“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¹⁰⁶花驚定既僭用天子禮樂,依杜甫十三世祖杜預之見,當“刊而正之,以示勸戒”。《論語·季氏》引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¹⁰⁷花驚定不過一西川牙將耳,救平梓州之亂固有其功,然恃功驕恣,僭用天子之禮樂;猶八佾舞於庭,孔子以為“是可忍,孰不可忍?”其人其事,《詩》與《春秋》,皆當譏斥之,誅伐之。褒德勸善、貶罪懲惡,以叙先後之倫,秩上下之分,固史外傳心之《春利》大義。

遠祖杜預之“《春秋》主解”,杜甫宗法體現於詩作之中,於是有《贈花卿》:“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之諷諭;此即杜預所稱孔子作《春秋》,“刊而正之,以示勸戒”之意。同時,自是杜甫實踐《祭遠祖當陽君文》所云:“不敢忘本,不敢違仁”之誠信與然諾。孟啟《本事詩》稱杜甫詩為“詩史”,凸顯“推見至隱”之《春秋》書法,《戲作花卿歌》、《贈花卿》二詩有之。《文史通義·史德》稱“必通六義比興之旨,然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信然!

(四)《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唐劉知幾《史通·叙事》稱:“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所舉例證,於《春秋》、《左傳》獨多。由此觀之,舉凡良史,莫不工於叙事傳人。杜甫作詩,亦長於叙事傳人,或有得於先祖杜預歷史叙事學之薪傳。

陳貽焮(1924—2000)《杜甫評傳》稱杜甫:“不僅用詩寫自傳,亦用詩為他人立傳。”¹⁰⁸自傳,如《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106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序》,《春秋左傳注疏》,卷首,頁10。

107 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8,頁172。

108 陳貽焮:《詩的自傳和列傳》,《杜甫評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卷下,頁1029—1033。

《述懷》、《北征》、《草堂》、《昔遊》、《壯遊》、《遣懷》諸詩；敘事傳人，為他人立傳者尤多，如《三吏》、《三別》、《飲中八仙歌》、《八哀》等，以及所謂敘事歌行“詩史”之詩篇，皆屬之。接續將討論《丹青引贈曹將軍霸》、《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三詩，特為藝術家立傳，尤為殊勝。杜詩圖寫人物，敘次事蹟，得敘事尚簡、用晦之妙，考其書法，頗有可觀。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以下簡稱《丹青引》），作於代宗廣德二年（764），杜甫時年五十三歲。假詩歌韻文形式，為藝術家曹霸立傳。《丹青引》詩，敘寫曹霸之家世、門第、出身、學歷、經歷、嗜好、素養，以及當下境遇。讀之，不但見詩如見其畫，而且朝代盛衰，平生榮枯，場景歷歷，如聞如見。詩云：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
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
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
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
先帝御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
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
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
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騮氣凋喪。
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
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¹⁰⁹

杜甫作《丹青引》詩，以安史之亂作為曹霸藝術生命之分水嶺：之前為宮庭御用畫師，畫凌煙功臣圖像、畫天馬玉花驄。一旦戰亂發生，曹霸隨之漂泊干戈之際，由一代宮廷畫師，遽而淪落為街頭畫家。或逢佳士亦寫真，或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遭白眼，坎壈日纏身。地位遭遇之升降，前後反差極大。藝術家曹霸，

109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3，頁1147。

堪稱開元、天寶大時代之縮影。蘇軾《傳神記》稱圖繪人物，如優孟衣冠，不必“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¹¹⁰ 叙事傳人亦然，止在凸顯個性特徵，所謂“傳神寫照，都在阿睹中”。杜甫《丹青引》之叙事傳人，信有此妙。

許顥《許彥周詩話》評杜甫作《丹青引贈曹將軍霸》，持與蘇東坡作《妙善師寫御容》相比較，謂論美妙生動，蘇軾詩不如杜甫。《許彥周詩話》云：

東坡作《妙善師寫御容詩》，美則美矣，然不若《丹青引》云“將軍下筆開生面”，又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後說畫玉花驄馬，而曰“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此語“微而顯”，《春秋》法也。¹¹¹

《史通·叙事》論叙事之體，標榜尚簡與用晦：“略小存大，舉重明輕”，為其中之一法。¹¹² 杜甫《丹青引》，為藝術家立傳，取材筆削，傳神寫照處亦妙用之，暫且不論。至於《許彥周詩話》論杜甫叙曹霸畫馬，而曰“至尊含笑”云云，評此語以為“微而顯，《春秋》法也。”則大有闡說空間。筆者以為：微而顯，猶《史通·叙事》所謂用晦、尚簡。於《詩》，為六義之比興；於文學，為避就留餘之法；於《春秋》書法，則為或筆或削相形，可以互發其蘊，互顯其義之方。

明楊慎(1488—1559)曾言：“馬之為物最神駿，故古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情。”¹¹³ 黃永武教授有《杜甫筆下的馬》一篇妙文，論證杜甫平生所寫詠馬詩，都有其特殊之寓意：馬或代表英雄之氣概、或申述暮年之壯志、或自況一生之辛勞、或象徵君臣之遇合、或比喻知遇之難覓、或暗示國勢之盛衰、或縮連先帝之追思。¹¹⁴ 綜觀《丹青引》，叙寫曹霸之出身、恩遇，及晚年窮困潦倒，一生之盛衰榮枯，都繫於先帝事業之盛衰。所以，這首詠馬詩，寫今昔異時，喧寂頓判，所興寄者，即是先帝之追思，可作感遇詩看待。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稱：

110 《傳神記》，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12，頁400。

111 許顥：《許彥周詩話》，何文煥：《歷代詩話》，頁381。

112 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6，頁168—173。

113 同上注，引“楊慎曰”，頁1152。

114 黃永武《杜甫筆下的馬》，見氏著《中國詩學·思想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9年），頁187—197。

“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筆者以為：六義比興也者，詩、史、文、《春秋》，可以通言之。《丹青引》，又何嘗例外？

唐玄宗帝位之升降，大唐國勢之隆盛陵夷，在在攸關曹霸一生之窮達榮枯。《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一詩，迴環往復，正申明此一現實。明王嗣奭《杜臆》以為：“余謂此詩：公借曹霸以自狀，與淵明之記《桃源》相似。讀公《莫相疑行》，而知余言之不妄。”¹¹⁵比興寄託，陶淵明《桃花源記》有之，杜甫《丹青引》，借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之塊壘，亦自是杜甫興寄之作。清末郭曾炘（1855—1929）《讀杜笱記》稱：“《丹青引》，太史公列傳也。多少事實，多少議論，多少頓挫，俱在尺幅中。”¹¹⁶太史公《史記》，魯迅評為“無韻之《離騷》”，以敘事傳人多出於六義之比興也。郭曾炘視杜甫《丹青引》，為太史公列傳，已洞見杜甫比興寄託之意趣。

杜甫《丹青引》，敘寫曹霸列傳，自治世至亂世，由一以知萬，小中而見大，頗具藝術之匠心。前幅敘寫宮廷畫師曹霸之榮寵恩遇，後幅描繪街頭畫家曹霸之落魄潦倒。同為一人，前後對比敘事，配以約文屬辭，杜甫所謂“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者，於此見之。清姜炳璋（1709—1786）《讀左補義》論《左傳》敘事，運用《春秋》屬辭比事之法云：

若一傳之中，彼此相形，而得失見；一人之事，前後相繫，而是非昭。……伯未興之前，與有伯相比；有伯之後，與無伯相比，而世變可知。條理燦著，脈絡貫通，觸處皆屬辭比事之旨也。¹¹⁷

杜甫薪傳《春秋》家學，運化屬辭比事之《春秋》書法，作為篇章經營、屬辭約文之利器。詩篇結構佈局，詳寫重叙往昔之寵遇殊榮，略言輕點現今之蕭瑟淒涼，前後兩相對比敘事，照應有情，沈著有味，盛衰榮枯之實境，遂躍然紙上。於是俯仰之間，感慨繫之。姜炳璋《讀左補義》說《左傳》屬辭比事，所謂“彼此相形，

115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王嗣奭：《杜臆》，卷6，頁200。

116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郭曾炘：《讀杜笱記》引張惕庵云，頁255。

117 姜炳璋：《綱領下》，《讀左補義》，（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卷首，頁106—107。

前後相繫”，而世變可知。

由此觀之，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詩，以言內之實事，書寫言外之重旨，感發情思，興寄深微。所謂“微而顯，《春秋》法”者，蓋深得比事屬辭《春秋》教之心法。不止於“至尊”“圉人”二句而已。唐孟啟《本事詩》稱杜甫詩為“詩史”，所謂“推見至隱”之《春秋》書法，《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自有體現。

(五)《韋諷錄事宅觀曹將畫馬圖歌》

代宗廣德二年(764)，杜甫年五十三歲。於四川成都草堂，作《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以下簡稱《觀曹將軍畫馬圖歌》)。此詩與《丹青引》，為同時作品。二詩之詩題、內容，雖皆關涉曹霸，然敘事之視角不同，凸顯之主軸有異，各自有其側重，故皆不失為名篇佳製。

《觀曹將軍畫馬圖歌》，本詠曹霸畫馬：“照夜白”“拳毛騮”“獅子花”、七匹、九馬，皆曹霸畫筆下之馬，而巧手丹青，畫馬似真馬；杜甫詠畫，以真擬畫，形容妙尚有如此者。其詩曰：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
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
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
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嘆嗟。
此皆戰騎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迴若寒空動煙雪。
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廡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
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
騰驥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
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¹¹⁸

《觀曹將軍畫馬圖歌》，叙寫曹霸曾圖繪先帝照夜白，繼畫太宗拳毛騮、郭子儀

118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3，頁1152。

家之獅子花，又畫七匹殊絕之駿馬。終因照夜白，憶及玄宗之愛馬與愛材：昔者“騰驤磊落三萬匹”，今則玄宗駕崩，“龍媒去盡鳥呼風”。盛衰今昔，對比強烈如此，不能無感慨。清浦起龍《讀杜心解》稱：“此以先朝已往之真馬作襯，以三萬匹襯九匹，是多襯少。”¹¹⁹舉輕明重，小中見大，納須彌於芥子之中，此敘事尚簡之書法。明王嗣奭《杜臆》稱：“馬之盛衰，國之盛衰也。公閱此圖，有不勝其痛者矣！”¹²⁰詠物（馬），能因小見大，有所寄託，故筆有遠情。杜甫敘事詠物，兼用六義比興，此又一例。

烘雲托月之陪敘法，往往為編比史事之藝術，《觀曹將軍畫馬圖歌》首尾尤多體現：開篇以江都王陪襯曹霸，轉折處再將支遁烘托韋諷，此就敘記人物而言，已藉比事以見指義。詩篇之主體，在叙次九馬之神駿，卻先叙照夜白，以為陪襯，詳其寵錫之所出。懷思先王之主意，見於言外。本結九馬，卻旁叙到三萬匹去。因三萬匹駿馬，再次聯結到先皇。如曲終江上，卒章顯志，不勝龍媒之悲。¹²¹其殊勝處，尤在陪敘之錯綜穿插運用。姜炳璋《讀左補義》所謂“彼此相形”“前後相繫”之屬辭比事書法，於此再次體現。

杜甫《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作為畫馬圖之佳構，堪稱詠物詩之美妙者。黃永武教授《詠物詩的評價標準》指出：美妙之詠物詩，必須體物得神，參化工之妙；因小見大，有所寄託；投入生命，喚起心靈。¹²²以此衡之，《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二詩，沈鬱頓挫，為其共同風格。《杜詩詳注》引張潛評此詩：“杜詩詠一物，必及時事，故能淋漓頓挫。”杜甫所謂“比興體制”，即此是也。曹霸藝術生涯之登峰造極，與開元、天寶盛世，如雲從龍、風從虎，聲應氣求，息息相關。撫今追昔，感慨遂不能自己。興寄從之，亦情理之當然。

孔子筆削魯史記，而成《春秋》，其微辭隱義，經由敘事之或詳或略、或重或輕，委婉表述。杜甫作《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之比事，可作明證。黃生《杜詩說》以為：杜甫叙賜物，詳略有法；叙九馬，亦詳略有度。¹²³自章學誠《文史通義·

119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浦起龍：《讀杜心解》，卷2，頁292。

120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王嗣奭：《杜臆》，卷6，頁199。

121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杜甫著，楊倫注：《杜詩鏡銓》，卷11，頁533。

122 黃永武：《詠物詩的評價標準》，《詩與美》，（臺北：洪範書店，1984年），頁166—177。

123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黃生著，徐定祥點校：《杜詩說》，卷3，頁91。

答客問上》稱：“《春秋》之義，昭乎筆削。”¹²⁴詳略、異同、重輕、忽謹之去取從違，可藉以表現出筆削之指義，藝術之匠心。《觀曹將軍畫馬圖歌》，如圖繪先帝照夜白時，所叙賜物及榮光，如“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相較於畫太宗拳毛騮，畫郭家獅子花，為詳、為重。為先帝圖繪，杜詩則詳書重叙；為唐太宗、郭子儀畫圖，賜物則略去闕如。懷思先帝之微意，見諸屬辭比事之詳略去取矣！至於叙九馬，亦重輕詳略有序。照夜白，重寫詳叙。拳毛騮、獅子花二馬，略叙輕點。叙寫“其餘七匹”之殊絕，曰“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廡養森成列。”再總提“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以上，大抵多從題面“畫馬圖”叙寫，詳略重輕之不同，見分主分賓之殊異。

唯六義比興之法，往往觸事生情，主客易位。先帝云云、憶昔云云、自從云云，乃追思之意趣，卻題外生情。可知，此詩“意不在畫，並不在曹將軍”，而在追思先帝明皇。就詩題而言，主軸既不在曹將軍、亦不在畫馬圖，卻聚焦在題外之先帝，詳賓而略主，藉賓以形主，詩材之取捨筆削如此，造就詳略、重輕、虛實之絕妙烘托。由此看來，詳略、重輕、虛實之筆削取捨，與全詩立意之主從重輕，大有關係。

杜甫詠物詩，如《畫鷹》、《除草》、《義鶡行》、《病馬》諸什，寄託之妙，大抵如《病馬》詩所云：“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沈吟。”何況，《觀曹將軍畫馬圖歌》，歌詠皇家之鞍馬，能發乎比興寄託，則不纖巧、不淺露；借形象描寫，則容易強化感染力。¹²⁵ 黃永武教授《詩與美》稱：“詠物詩必須因小見大，有所寄託，才能使筆有遠神”；“詠物詩最好有作者生命的投入”云云。¹²⁶《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以及上述之詠物詩，皆切合詠物詩之終極標準。詠駿馬、詠劍器，能以小觀大，看盡開元天寶五十年之治亂興衰。猶花鳥寫意畫，蘇軾所謂能以“一點紅”，解寄“無邊春”，並臻極品。

124 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頁 252。

125 傅庚生：《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沈吟——杜詩的寄託》，《杜詩散繹》，（香港：建文書局，1971年），頁 236—247。

126 黃永武：《詠物詩的評價標準》，《詩與美》，頁 170—177。

自《春秋》、《左傳》、《史記》之歷史敘事，經杜預《春秋經傳集解》，至杜甫敘事歌行，要之，多不離《孟子·離婁下》所稱“其事、其文、其義”之敘事義法。杜甫所謂“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孟啟《本事詩》稱杜詩為“詩史”，標榜“推見至隱”之《春秋》書法；錢鍾書《管錘編》所謂“言在于此，意在于彼”之興寄，多不疑而具。由杜甫所作詩史、敘事歌行觀之，敘事可以兼含抒情，抒情不足以概括敘事。

（六）《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作於夔州白帝城，時當大曆二年（767），杜甫年五十六。詩之本事，前後觀舞之來龍去脈，詩《序》叙之極詳。中言“撫事慷慨，聊為《劍器行》”，知本詩立意，不離劍器，亦不在劍器，蓋寓託抒情於敘事歌行之中也。詩《序》云：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持宅見臨穎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灑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為《劍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嘗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公孫大娘所舞之“劍器”，為古代武舞之一。唐司空圖《劍器》詩所謂：“樓下公孫昔擅場，空教女子愛軍裝。”《文獻通考·舞部》稱：“其舞，用女伎雄妝，空手而舞。”或以劍器為刀劍，非是。《詩序》言：“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灑頓挫”；渾脫，空手作舞劍之勢。瀏灑頓挫，傳寫舞法騰旋頓挫之勢。起落收合，低昂旋轉之舞姿，嶙峋波瀾，曲折三致，不足以形容。故張旭“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草書之豪蕩感激，良因公孫大娘所舞劍器“瀏灑頓挫”之勢，而有所通感妙悟。

《詩序》開端，大書特書“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又云“開元三載”，大有孔子《春秋》書“王正月”，標榜大一統之義。宋黃徹《碧溪詩話》，認證子美世號“詩史”，舉《北征》：“皇帝二載秋”；《送李校書》：“乾元元年春”；《戲友》詩，兩言“元年建巳月”為證，推崇“史筆森嚴，未易及也。”¹²⁷清黃生《杜詩說》亦云：“觀舞，細事爾，《序》首特紀歲月，蓋與‘開元三年’句打照，并與詩中‘五十年間’句針綫。無數今昔之悲，盛衰之感，俱于紀年見之。”¹²⁸世所謂詩史，此又一義也。《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詩曰：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
燿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青光。
絳脣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穎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
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
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瀕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
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
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躡荒山轉愁疾。¹²⁹

本詩開門見山，回憶兒時，觀看公孫大娘之舞蹈藝術，以燿如、矯如、來如、罷如，形象譬況舞姿之“瀏灠頓挫，獨出冠時”。馬茂元先生稱：“用筆之妙，如有七寶樓臺，彈指即現，變幻起滅，使人移神目眩，應接不暇。”¹³⁰此即弟子李十二娘“傳芬芳”“神揚揚”者。舞藝薪傳之間，有昔盛今衰之感慨，“五十年間似反掌”的滄桑。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錢鍾書《管錐編》論寄託，稱“詩中所未嘗言，別取事物，湊泊以合，所謂言在于此，意在于彼”。《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先帝”至“瞿塘”一段，感時撫事，表層敘事，特提“公孫劍器初第一”；

127 黃徹著，湯新祥校注：《碧溪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卷1，頁10。

128 黃生著，徐定祥點校：《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杜詩說》，卷3，頁100。

129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20，頁1815—1818。

130 傅庚生、傅光選編：《百家唐宋詩新話》，（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9年），頁228。

深層抒情寫懷，感歎“五十年間似反掌”。安史之亂以來，家國固然多難，杜甫亦飄泊無依，如高適《人日寄杜二拾遺》詩所謂：“東西南北人”。家國盛衰之感，特寄託女樂，以抒情寄慨。言公孫，而統及女樂；言女樂，即是感深先帝。故《讀杜心解》稱：“舞劍器者，李大娘也；觀舞而感者，乃在其師公孫大娘也；感公孫者，感明皇也。是知劍器特寄託之端，李娘亦興起之藉。”¹³¹劍器特寄託之端，李娘亦興起之藉，可見興寄諷諭之妙。反客為主，虛實互用，可以為宗法。

清楊倫《杜詩鏡銓》亦云：“此詩詠李氏，思及公孫；詠公孫，念及先帝。全是為開元天寶五十年來治亂興衰而發。”¹³²五十年來治亂興衰，藉由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而發，是言在此，而意在彼之興寄、寄託、諷諭。《春秋》書法，有“錄其重者，錄其猶可得而言者；其輕者略之，其不可言者諱之。是故，輕重亦詳略之辭矣。”¹³³《春秋》書法，或舉輕以明重，或舉重以明輕；《周官》書法，則或舉偏而概全，或因彼以見此；¹³⁴《文心雕龍·物色》之“以少總多”，蘇軾《傳神記》之“頰上三毫，得其意思所在”，要皆相通相融。清方東樹《昭昧詹言》亦言：“‘感時’句，是一篇前後脈絡章法也，卻入於出題中藏之。‘金粟堆’又從先帝意中起稜，但覺身世之戚，興亡之感，交赴腕下。”¹³⁵由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而“覺身世之戚，興亡之感”，是妙用比興寄托之法，吟詠情思，是詩史敘事，可以兼抒情寫懷而一之，亦由此可見。

藉由小人物之遭遇，觀看大時代之脈動，是杜甫敘事歌行，譽稱為“詩史”主要特徵之一。《哀江頭》、《丹青引贈曹將軍霸》、《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如此，《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亦然。本詩表面好像偏重敘寫公孫大娘，核心主旨卻在懷念故君。黃永武教授稱：“《序》裏提‘先帝’，詩中也呼‘先帝’。和諸葛亮在《出師表》中疊呼‘先帝、先帝’，一樣地忠心耿耿。”¹³⁶蘇軾《王

131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浦起龍：《讀杜心解》，卷2，頁315—316。

132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楊倫：《杜詩鏡銓》，卷18，頁611。

133 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頁221。

134 方苞：《周官析疑序》，《方望溪先生文集》，卷4，頁51。

135 方東樹：《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卷12，頁265。

136 黃永武、張高評：《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唐詩三百首鑑賞》，（臺北：黎明文化圖書公司，1986年），冊上，頁209。

定國詩集叙》稱：“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¹³⁷杜甫忠於君國，一篇之中而三致其意焉，此詩可見。

《左氏傳》之叙事傳人，比事屬辭，多牽上搭下之法，往往爲一篇之關樞。《史記》中《管晏列傳》、《屈原賈生列傳》，即比屬叙事之流韻。¹³⁸《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詩，叙寫公孫弟子、臨穎美人，在“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之後，接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句，作爲牽上搭下之叙事法。既喚出“先帝”，乃引發“五十年間”之滄桑。“撫事增惋傷”以下十二句，“韻脚由平聲轉爲急促的入聲”（如押一、室、日、瑟、出、疾諸字），“顯現出絃急柱促的嗚咽音調”。依聲義同源、字義起於字音說之學理，¹³⁹杜甫“晚節漸於詩律細”之自道（《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此詩可證。因聲寫意，此又杜甫叙事歌行，出於“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外，以叙事爲抒情之一法。

五、餘 論

陳貽焮教授《杜甫評傳》言：“杜甫不僅用詩寫自傳，也用詩爲他人立傳。”杜甫詩之叙事歌行，號稱“詩史”，與推見至隱之《春秋》書法相關，與六義之比興寄託亦相交涉。杜甫《祭遠祖當陽君文》，既贊揚“《春秋》主解，稿隸躬親”，宣稱不敢忘本，不敢違仁。故繼志述事，作叙事歌行，多體現《春秋》或筆或削之書法。杜甫叙事歌行，所謂“詩史”者，本文選取其中之七篇，已論證如上。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論《北征》、《新婚別》、《洗兵馬》三詩，爲“微而婉，正而有禮”；稱“《乾元中寓居同谷七歌》，真所謂主文而譎諫。”微而婉、主文譎諫，牽涉到忌諱叙事之《春秋》書法。其他，如《悲陳陶》、《悲青阪》、《留花門》、

137 《王定國詩集叙》，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10，頁318。

138 張高評：《左傳之文學價值》（修訂重版），（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9年），第九章《叙事文學之軌範》，頁244—245。

139 劉師培：《正名隅論》，《劉申叔遺書》（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年），冊3，頁1660—1669。章太炎：《語言緣起說》稱：“同一聲類，其義往往相似。”見氏著《國故論衡》，（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冊上，頁43。

《杜鵑行》、《杜鵑》、《憶昔二首》、《諸將五首》諸什，杜甫詩史所陳，多為現代、當代之歷史，其中“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者必多。杜甫詩史，如何“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此攸關《春秋》書法之另個面相——忌諱敘事之藝術，值得再探。

杜甫所作其他敘事歌行，歷宋朝至清代千年間，見於詩話、筆記、文集、序跋討論，杜詩學者評述者不少。如《北征》、《洗兵馬》、《留花門》、《大麥行》、《苦戰行》、《去秋行》、《冬狩行》、《負薪行》、《最能行》、《折檻行》、《虎牙行》、《錦樹行》、《歲晏行》、《蠶谷行》等詩，多反映時事於新題樂府中。敘事歌行諸篇，於筆削見義、六義比興之體現如何？宋、清詩評家於敘事傳統之接受又何若？在在值得另立專題探討之。

再如詠物詩篇，如《義鵑行》、《天育驃圖歌》、《瘦馬行》、《杜鵑行》、《杜鵑》諸什，亦皆發乎比興之敘事詩史，要皆值得探究。限於篇幅，他日再議。

（作者：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臺灣成功大學名譽教授）

引用書目

一、中文

(一) 專書

-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 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年。
- 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方東樹：《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 方苞：《方望溪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黃生著，徐定祥點校：《杜詩說》。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
- 方韜：《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 王逸注，洪興祖補注，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王嗣奭：《杜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司馬遷著，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年。
- 司馬光奉敕編集，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臺北：粹文堂出版社，1975年。
- 左丘明著，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朱熹：《詩集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91年。
-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
- 李孝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注釋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
- 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杜甫著，浦起龍注：《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70年。
- 杜甫著，楊倫注：《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杜甫著,錢謙益箋注:《錢注杜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杜甫著,趙次公注,林繼中輯校:《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阮元編:《皇清經解》。臺北:復興書局,1972年。
- 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紀昀等主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
- 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 胡子著,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姜炳璋:《讀左補義》。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
- 徐中玉主編,陳謙豫副主編:《意境·典型·比興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 孫奕:《履齋示兒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章太炎:《國故論衡》。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
- 章學誠:《章氏遺書》。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年。
- 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 陳善:《捫蝨新話》。香港:龍門書店,1967年。
- 陳尚君:《濠上漫興——陳尚君讀書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 陳伯海:《唐詩學引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6年。
- 陳伯海主編:《唐詩彙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 陳貽焮:《杜甫評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張忠綱:《杜甫詩話六種校注》。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
-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臺北:里仁書局,2011年。
-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6年。
- 張高評:《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臺南:成功大學出版社,2000年。
- 張高評:《左傳之文學價值》(修訂重版)。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19年。
- 《御選唐宋詩醇》。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
- 郭曾炘:《讀杜劄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黃生著,徐定祥點校:《杜詩說》。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
- 黃永武:《詩與美》。臺北:洪範書店,1984年。
- 黃永武、張高評:《唐詩三百首鑑賞》。臺北:黎明文化圖書公司,1986年。
- 黃永武:《中國詩學·思想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9年。
- 黃徹著,湯新祥校注:《苕溪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

- 曾棗莊等編：《全宋文》。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
- 傅庚生：《杜詩散釋》。香港：建文書局，1971年。
- 傅庚生、傅光選編：《百家唐宋詩新話》。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9年。
- 董仲舒著，蘇輿注：《春秋繁露義證》。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
- 葉政欣：《春秋左氏傳杜注釋例》。臺北：嘉新水泥公司基金會，1966年。
- 趙汭：《春秋屬辭》。臺北：大通書局，1970年。
-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魯迅著，顧農講評：《漢文學史綱要》。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
- 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劉師培：《劉申叔遺書》。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年。
- 劉熙載著，徐中玉、蕭華榮校點：《劉熙載論藝六種》。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
-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 蔡正孫著，常振國、絳雲校點：《詩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錢鍾書：《管錐編》。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年。
- 戴聖傳，孫希旦集解：《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
- 魏慶之：《詩人玉屑》。臺北：世界書局，1971年。
-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二) 論文

- 張高評：《杜甫詩史與〈春秋〉書法——以宋代詩話筆記之詮釋為核心》，《人文中國學報》第16期(2010年9月)，頁55—96。
-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章學誠之〈春秋〉教：史學、敘事、古文辭與〈春秋〉書法》，《中山人文學報》第36期(2014年1月)，頁31—58。
- 張高評：《屬辭比事與〈春秋〉之微辭隱義——以章學誠之〈春秋〉學為討論核心》，《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17輯(2015年10月)，頁152—180。
- 張高評：《〈春秋〉〈左傳〉〈史記〉與敘事傳統》，《國文天地》第33卷第5期(2017年10月)，頁16—24。
- 張高評：《杜甫詩史、敘事傳統與〈春秋〉書法》，《人文中國學報》第28期(2019年6月)，頁91—130。
- 張高評：《〈容齋隨筆〉論〈左傳〉〈史記〉——以〈春秋〉書法詮釋為例》，《新宋學》第7輯(2019

年10月),頁114—139。

張高評:《〈春秋〉五例與〈左傳〉之忌諱敘事》,《國文天地》第35卷第5期(2019年10月),頁103—107。

張高評:《〈史記〉忌諱敘事與〈春秋〉書法——以征伐匈奴之相關人事為例》,《嶺南學報》第12輯(2019年12月),頁19—59。

張高評:《〈左傳〉敘事見本末與〈春秋〉書法》,《中山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頁1—13。

葛曉音:《論杜甫的新題樂府》,《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第1期,頁197—204。

松原朗:《杜甫的歌行》,《中國詩文論叢》第四集,日本中國詩文研究會,1985年。

**On Du Fu the Poet-Historian and
Analogy-Metaphor of the Six Principles,
with Remark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rative Ballads and the Style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Kao Ping Chang

(Emeritus of Yang Zhou University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Du Yu (222 – 285) of the Jin Dynasty was the great, great-grandfather of Du Fu (712 – 770) by thirteen generations. In the “Introduction” to his *Variorum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ith Zuo’s Commentaries*, Du Yu described four devices of the classics, namely “subtlety,” “euphemism,” “manifestation,” and “ambiguity”;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 punishing the evil and commending the virtuous. He illustrated countless devices of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and became a great contributor to the study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Du Fu wrote “A Funeral Oration for My Remote Ancestor, Lord of Dangyang” when he was thirty years old, in which he claims that he does not dare to forget his origin nor go against the principle of benevolence. Therefore, both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poetry became the legacy of the Du family. When Du Fu wandered to the Long and Shu regions in southwestern China, he wrote poems in the form of narrative ballad, which won him the sobriquet of “poet-historian.” Meng Qi (*jinshi* 875) in his *Benshi shi* praised him for “inferring the most obscure content without missing anything.” Du Fu employs devic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writing narratives and biographical accounts. These devices include

combining diction and enumeration of allusions, revealing meaning in refined wording; providing a faithful account of events to unveil the good and bad; inferring the most obscure content in subtle, indirect, manifesting, and ambiguous ways; including the whole picture with one small part and realizing one thing by means of another; recording minor and abridged details and illuminating the important through the minor; directly condemning the indecent and writing euphemistically to hide it if necessary; contrasting one part with another and establishing the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deploying diction and allusions;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s concern how the acts of recording and deletion reflect one's choice between giving details or simplifying, disagreement and agreement, stressing and ignoring, and neglecting and taking seriously. During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Du Fu wrote some narrative poems in ballad form, such as "The Beautiful Ladies," "Lament by the Riverside," "To Minister Hua," "A Song on Minister Hua Written Playfully," "Song of Painting, a Gift Poem for General Cao Ba," "Viewing a Painting of a Horse By General Cao at Secretary Wei's Residence," and "Watching a Sword Dancing Performed by the Disciples of Madam Gongsun." In these poems, Du Fu not only adapts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o that of a poet-historian, he also lodges his own sentiments in the narrative content. This practice is a realization of "a mode of analogy and metaphor," a comment he makes on Yuan Jie's (723 – 772) "On Chongling." They also fit Zhang Xuecheng's (1738 – 1801) comment: "One must first become proficient in the main ideas of analogy and metaphor and the Six Principles before one can talk about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 tradition of narration can be compatible with the tradition of lyricism. This can be seen in the works of poet-historian Du Fu: "analogy and metaphor are made by genuine thought and praise and criticism can be found in his poems in various forms."

Keywords: Du Fu the Poet-historian, the six principles and analogy and

metaphor, the acts of recording and deletion reflecting one's intent, narrative ballad poetic form, the writing method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narratology